卷首语

乐黛云

“是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的多元发展？”也就是说“现代性”一词应是单数还是复数？这是我们近年来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杜维明先生对这一问题有多年独到的研究。他大体认为现代性是从西方“一根而发”，但他同时强调不同的文化对现代性有深刻的“塑形作用”，因此更重要的是“在地生根”，形成了多元的现代性。如中国受到西方影响，生长出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质的规定性。如果不承认有多种现代性，就会认为西方现代化是当代唯一的文化主体，西方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就会成为唯一的普世价值；而东方的核心价值则永远只能是地方性的“亚洲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也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但杜维明先生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大大开掘了问题的深度。

本期的主打栏目是生态文明。专论“文明的政治”论述了许多当代的核心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提出：“为了让过量生产和能源消耗的机器减速，文明的政治必将成为唯一的出路”，而文明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则是提高生命的品质，即生态环保和社会交往。“生态文明新思考”一栏的7篇文章分别从美学、符号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讨论了当代生态文明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区分，指出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只是以人类为中心保护环境。这无疑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

跨学科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我们心向往之的重要领域。本期刊登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物理学博士陈方正教授的专文，这是陈方正教授10年磨一剑写成的巨著《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爲何出現于西方》中最精萃的核心篇章，这里还发表了同样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学家的金观涛教授对该书精辟的讨论，同时也发表了陈方正教授的回应。

“古典新读”是本刊将陆续推出的一个重点栏目。文化发展各有自己的谱系

以往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多为“拿来就用”，至于其来龙去脉往往不甚了然，以至难于把握其实质。因此必须正本清源，重读经典；而这样的重读又不可脱离当前的时空。本期发表的5篇文章虽各有侧重但都努力做到这一点。

方法论是本刊着重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本期“方法论专栏”中，“数字化人文研究的个案方法”一文率先研究了建设数字信息大国，带动人文学科理念和工具变革的问题。另一篇文章则强调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只能植根于它与世界的平等对话和互动之中，中国学者将根据中国的经验，认真梳理跨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方法。

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期也有新的发展，例如提出“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理基础必须重新检讨”，建议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应用“新实证主义方法”，强调必须辨析“文学交流”与“文学关系”两个不同概念，提倡将“比较语义学”应用于中外文学关系史，在点、线、面的研究中加强对“点”的研究；主张在研究“文学相遇时的交叉、交锋、交融等现象“时，将翻译作为”最值得着重探讨的领域”等，这些都能引发新的思考。

本刊自26期起，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我们对已合作三年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致以深切的谢意，对新的合作伙伴充满热望与期待。